

# 疏理與考權：《良友》、《大眾》 以及梁得所衍生的幾個疑問

劉怡伶

## 摘要

本文探討近代上海的知名畫報——《良友》、《大眾》的版本、圖片及其衍生的相關問題；主要論涉四個方面：一、辨析《良友》的諸種影本；二、透過《良友》各影本之對照，以考辨刊物的頁碼印製、文字塗抹、再版發行等問題；三、辨證《良友》讀者所曾誤認的照片；四、藉由梁得所主編的《良友》、《大眾》，以推考〈國旗歌〉歌詞撰者的問題。

筆者發現《良友》第25期曾再版，而《良友》第88期文字刪抹的現象應屬讀者個人所為，至於《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原版即已漏印頁碼，而非重印時所致，另外，《良友》不察讀者所誤認，而將蔣緯國錯認為蔣經國。

本文也試圖辨究《良友》刊登梁得所寫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乃是中華民國〈國旗歌〉歌詞的底本，澄清長期以來官方版的〈國旗歌〉歌詞是出自戴季陶的說法，進而推測中華民國〈國旗歌〉的原創者應是梁得所。

**關鍵詞 (Keywords)：**良友；大眾；梁得所；上海；國旗歌；戴季陶；蔣經國；蔣緯國；黃自  
Liangyou Huabao (the Young Companion Pictorial Magazine) ; Cosmopolitan  
Huabao (the Cosmopolitan Pictorial Monthly Magazine) ; T.S. Leung ;  
Shanghai; National Flag Anth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Ji Tao Dai ;Jing Guo  
Jiang; Wei Guo Jiang; Zi Huang

劉怡伶：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兼主任；E-mail：ncue610@gmail.com

## 一、前言

上海時期的《良友》畫報<sup>[1]</sup>，從1926年創刊至1946年停刊，發行了近二十年，共出172期、特刊兩期（1926年11月《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1933年12月《良友八周年紀念特刊》〔美術攝影專集〕），它見證了上一世紀前半段的社會變遷。在《良友》歷任主編中，創辦人伍聯德說：「『良友』雖由我創辦，但貢獻最多的還推梁君（筆者按：梁得所）」<sup>[2]</sup>，梁得所是第三任主編，他一生傾力於畫報的編輯工作，在良友公司階段，自選材到編排，曾提出許多新穎的構想，嘗試改變畫報先前予人之排遣時間、粗製濫造的形象。他扭轉了當時外界對畫報的負面觀感，提升了畫報的品質。<sup>[3]</sup>《良友》掀起了具有典範意涵的「良友現象」，使得許多畫報在編輯理念、技巧、內容方面追摹《良友》，其先驅作手即是梁得所。後來，梁得所離開良友公司，另創大眾出版社，主編包含《大眾》畫報在內的五大刊物<sup>[4]</sup>，從1933年11月第1期至1935年5月，計主編《大眾》十九

<sup>[1]</sup> 《良友》畫報的中文刊名有多個異稱，如：「良友報」、「良友圖畫月報」、「良友報月刊」、「良友圖畫雜誌」、「良友雜誌」、「良友畫報」、「良友」，以上說法的交集為「良友」，然月報、雜誌、報刊之稱屬，卻不一致。以期刊言，固然以月刊為主，但發行期間曾一度改為半月刊，故以月報、月刊為稱並不周全；若僅謂《良友報》則無法突顯其圖像取向的特色；第37期之後的版權頁均註稱《良友圖畫雜誌》一此為官方正式刊名，但每期封面只註明「良友」二字，故一般人慣稱《良友》，不過這樣卻不見以圖為主的特色，且若侷限版權頁所署圖畫字面意思，又難涵蓋內容登載許多照片的狀況，因此，顧及圖像（圖畫、照片）的主調，「良友」+「畫」+「報」的組合邏輯一即「《良友》畫報」之稱，應較符實況，又據臺灣商務印書館發售影印合訂本之樣本簡介，其中亦謂：「從創刊號開始，封面只題『良友』二字，內頁目錄則作『良友畫報』；而自第37期（18年七月號）起以迄終刊，其版權頁均作『良友圖畫雜誌』，唯一般人士均稱之為『良友畫報』，約定俗成，今亦仍之。」可知「良友畫報」已是約定俗成的說法，然為便敘述，本文概簡稱《良友》。

<sup>[2]</sup> 伍聯德，《良友·回憶·漫談》（香港：良友畫報社·良友圖書公司，1966），頁33。

<sup>[3]</sup> 本文匿名審查人指出：「《良友》畫報在創立之初，得力於參考《倫敦新聞畫報》，由於上海的閱讀風尚，和第二任主編周瘦鵬（編5-12期）『鴛鴦蝴蝶派』色彩，其胎記還是『鴛鴦蝴蝶派』以及『小報』盛行影響下的產物，沈從文嘲諷為『新海派』。但據第四任主編馬國亮（編80-138期）所言，《良友》畫報除了軍事政治、國內外時事、還有經濟建設、社會生活、藝術文化、科學知識、電影體育、家庭婦女兒童等方面。本文論述的梁得所是第三任主編，編13-79期（1927年3月至1933年7月）。相較於《良友》畫報的創始者兼第一任主編伍聯德（編1-4期），梁得所是把畫報內容革新、奠定畫報地位的第一個編輯。」按第二任主編周瘦鵬以鴛鴦作風控制了《良友》，而讓《良友》擺脫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的柔軟軟靡陰影，並保留了該派的趣味性，梁得所的革新之功以及馬國亮的精益求精當居關鍵，他們為《良友》提升了刊物水準、設計了賞心悅目的版面，也發展出了明確實際的方針。

<sup>[4]</sup> 另四本是：《文化》月刊（1934年2月-1935年6月，十六期）；《小說》半月刊（1934年5

期。《大眾》是梁得所自創的畫報品牌，並一度使《良友》面臨生存危機。

梁得所主編的《良友》及《大眾》是中國現代畫報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刊物，對出版傳播、文藝界，影響尤大，梁得所及其編輯成果是研究近現代文學、文化發展不可忽略的課題，梁得所的編輯見解亦待完整而深入的探討。本文先就刊物版本部分立論，論述主軸側重四個《良友》影印合訂本方面問題，因諸影版間確實存在若干疑義，而學界迄今亦未見對原版、再版及不同影版之間的考辨<sup>[5]</sup>，此屬學術的基礎工作，釐清《良友》的版本問題，有裨進一步的相關探討；另外，《良友》以及《大眾》保留了重要的文字、影像資料，其中亦有若干尚待商榷的問題，本文亦一併考論。

## 二、《良友》諸版源流辨析

《良友》停刊後至今已過半個世紀，原刊本難以見及<sup>[6]</sup>，臺灣方面，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文哲所以及多所大學圖書館皆見皮藏，除了臺灣大學圖書館有上海書店版的影印本外，餘皆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影印合訂本，全套原本已不易尋覓。《良友》猶出刊時，即陸續有讀者公開徵求其過期畫報，甚至出高價以求割愛<sup>[7]</sup>，而《良友》編輯部也曾刊布徵求啓事，謂：「良友報以前所出各期，我們想彙齊幾份保存著；可是第九期所存留的都已散失，現在要徵求第九期三

---

月-1935年3月，前兩期月刊性質，十九期）；《時事旬報》（1934年7月-1935年5月，三十一期）；《科學圖解月刊》（1934年11月-1935年4月，六期）。

<sup>[5]</sup> 筆者的博士論文曾初步探討原版與影版的問題，見「〈良友〉與中國現代性的建構——以上海時期為中心」（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2007），唯仍有若干推論未能確證，因新材料陸續寓目，有利考權先懸而未解的疑問，本文即是在既有基礎上的持續追索。

<sup>[6]</sup> 本文匿名審查人表示：「過刊難以購買的現象十分普遍，刊物脫期再版情況也不少見。《良友》畫報創刊號，初版三千，兩三天全部銷完，再版二千，不足，又再版三千（筆者按：應為二千），這期共銷七千。」據第四任主編馬國亮的說法：「初版三千，幾乎在兩三天內全部銷光。隨著廣州、港、澳等地的書店也爭先恐後來訂購，再版二千，不足，又再版二千。這期共銷七千。在當時，這已是個不小的數字了。」《良友憶舊：一家畫報與一個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3。另見其撰〈《良友畫報》第一期〉，《讀書》（1979.10），頁82。

<sup>[7]</sup> 國內讀者如王雲路、李方舟、薛景文、汪泱、聶光地、錢紹杭、潘冷我、王墨琴；國外讀者如盧文章，皆曾登徵求啓事，此見《良友》2：16（1927.6），頁35；《良友》5：38（1929.8），頁30；《良友》6：49（1930.8），封底裡；《良友》15：108（1935.8），頁56；《良友》15：109（1935.9），頁56；《良友》15：110（1935.10），頁56。按：本文所據《良友》，為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合訂本。

本。」<sup>[8]</sup>即使現今健在的該刊老讀友—翁香光女士也只保存了1941年8月份的一張封面<sup>[9]</sup>，當時，《良友》的讀者有時甚至因為買不到某期刊物而闖入該公司，翁香光回憶道：「曾經有一次，公司裡闖進了一個不速之客，他口口聲聲要買半年前的一本《良友》。後來才搞清楚，原來他極愛《良友》，因為去年的一期沒有買到，就一路尋到公司裡來，我們看他那麼執著，就到倉庫裡去找了一本送給他了。」<sup>[10]</sup>足證當時已一本難求，因戰亂遷徙，能存留至今的，已屬鳳毛麟角。<sup>[11]</sup>謝其章在回憶他的搜書經驗時，數度提及《良友》：「海王邨院裡的個體攤上有《東方雜誌》、《紫羅蘭片》、《申報月刊》、《華北畫報》等，惜無《良友畫報》」、「《良友畫報》，今次只買到5本」<sup>[12]</sup>，可見《良友》蒐求之不易。<sup>[13]</sup>其實，當年《良友》的主編之一馬國亮欲重閱舊刊，即幾經波折，他說：「十多年前，北京的《讀書》月刊創刊不久，向我約稿。我就想著把《良友

<sup>[8]</sup> 《良友》2：15（1927.5），頁36。此外，亦曾刊佈小啓告知讀者已售畢之期數：「本報第1，2，3，4，7，8，9，10，11，12，18，20，21，各期經已售罄。」《良友》3：24（1928.2），頁35。

<sup>[9]</sup> 翁香光說：「是1941年8月份的一期，只剩這一張了。」見蔣爲民主編：《時髦外婆：追尋老上海的時尚生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頁303。按：翁香光之父親乃《良友》的股東，翁女則負責校對《良友》，其夫婿即該報副編輯張沉吉。又按：《時髦外婆：追尋老上海的時尚生活》原爲上海電視台「生活時尚」頻道推出大型專題影片「時髦外婆」的書面結集，透過採訪老上海一些過往人物的生活片段，講述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上海時尚生活。

<sup>[10]</sup> 蔣爲民主編，《時髦外婆：追尋老上海的時尚生活》，頁302。

<sup>[11]</sup> 創辦人伍聯德也惋惜自己所藏「多已在戰亂中散失」，見《良友·回憶·漫談》，頁122。又據伍聯德於1960年收到一位寄自美國檀香山讀者孫仲銘的來信，孫氏似乎有保存全套，孫仲銘謂：「我是愛護『良友』的長期讀者，在上海出版的良友畫報，雖經多次的世變，我幸而尚能全部保存……我視『良友』如珍寶，所以特別加意保藏，雖然經過數十年，內容印刷尚且清晰如新。」此函收於伍聯德《良友·回憶·漫談》，頁66。

<sup>[12]</sup> 謝其章，《搜書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頁50、70。

<sup>[13]</sup> 臺灣度藏原版之處，如中研院民族所圖書館、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其所收藏亦僅寥寥數期，蒐集全套原版之難，可見一斑。目前除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較爲完整的單冊原本之外，上海復旦大學亦收有《良友》原版111期，約計上海時期所出174期之六成三，已是目前兩岸各大學度藏殘本最豐富者。2006年7月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獎助下，筆者前往上海進行短期研究，原擬赴該校查對部分原本，然該批原件藏於復旦新聞系，不對外開放，遂未得見；而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也視之爲特藏品而不對外出借，根據趙家璧的說法，北圖此套舊《良友》，乃其代表良友公司所捐獻保存，此見其撰〈重印全份舊版《良友畫報》引言〉，收入《良友》（上海：上海書店，1986，影版），頁3；《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頁102。同一時間，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閱覽室」則正展出《良友》原本，由於舊版畫報珍貴，該館亦將其劃爲特藏品，一般讀者無緣借閱。

畫報》創刊的前因後果寫出來，給出版界史留下一點紀錄。當時早期《良友》整套的影印本還沒有出版，只知道上海圖書館藏有該畫報的若干期。我便上門以曾經是該畫報之編者的名義，希望可以重溫一下，摘些材料，完成我這篇稿子。不料事情並沒如此簡單。結果我跑了四個衙門，蓋了四個『批准』的印章，才獲准進去一間『閒人勿進』的室內翻看。」<sup>[14]</sup>足徵《良友》原刊本接觸之困難。<sup>[15]</sup>

目前可見的《良友》影印合訂本，計有：上海書店版（1986印行）、臺灣商務印書館版（1990印行）、上海圖書館〔港〕版（2007印行）、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2007印行）。上海書店與臺灣商務印書館（以下分別簡稱：上海版、臺灣版）的兩種版本應出自同一母本（論據詳後），至於上海圖書館藏而由香港良友公司再印的《良友》則又是另一影版（以下簡稱：上圖〔港〕版），而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所收《良友》複印本則是根據北京圖書館所藏的版本（以下簡稱：北圖版）。

上海版、臺灣版的《良友》應係出自同一母本，理由是：第7期封面刊名「良友」兩字之間均蓋有寶華公司的贈閱章（參圖1、圖2），再者，兩種影版的整體外觀大致相同，都是紅色套裝，上海版多了趙家璧的一篇引文（簡體），臺灣版則刊有馬國亮的序文（繁體），這是兩者不同之處。另外，趙家璧之女趙修慧的說法，也證實了筆者的推測，茲列其說：「重印《良友畫報》需要一份完整、清晰的母本，而此時畫報因出版日期久遠，在國內已瀕臨絕跡，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都沒有保存完整的全套原版本，幸好上海圖書公司所屬的上海舊書店專收舊書刊，自1956年成立以來，經30多年的收集，總算配齊兩套，雖然有的版面已有破損，但在製版、印刷部門的努力下，重印的《良友畫報》終於在1985年《良友畫報》創刊60週年前夕，開始發行、預訂。」又：

《良友畫報》在國內成功發行後，郭小丹（筆者按：上海圖書公司副經理）通過自己的好朋友、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陳萬雄先生向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連生建議「臺灣是否也印一些」。開始幾次沒有談成功，領導對郭小丹說：「你不要花這個心思了，弄不成功的。」1990年，陳萬雄請郭小丹

<sup>[14]</sup> 馬國亮，〈美國文化·淺而不薄——大鄉里看美國之三〉，香港版《良友》，115（1993.12），頁15-16。

<sup>[15]</sup> 對此，本文之審查人認為：「一般雜誌社若非有意識的對各期保留典藏，否則若干年後常會發生缺期情況。日後若要影印全套雜誌，常需向民間徵購。影印的印刷質量與徵集來的過刊保存狀況就有關聯，但不影響既有內容。」

到香港去（郭小丹此時已退休），次日張連生也到港。陳萬雄請他們一起用早茶，席間張問：「郭老，你一再建議臺灣影印發行《良友畫報》是什麼道理？」郭老說：「《良友畫報》1926年出版，蔣介石1927年上臺，《良友》每期都有國民黨政要的照片，現在這些人都已不在了，他們的子女和百姓都會想瞭解這段歷史。《良友畫報》極好地記錄了這段歷史。我估計臺灣可能不會有全套《良友畫報》，你們自己影印也難。如由上海印製，你們來發行，功德無量。」張回去考慮後決定印500套，親自到上海簽訂合同，上海方面簽字的是上海圖書公司經理俞子林，臺灣商務印書館為此次印刷出版共付美金21萬多。畫報印出後，通過香港商務印書館轉送至臺灣。<sup>[16]</sup>

至於上海圖書館裡的《良友》則應另有所據，從度藏的第7期封面並無寶華公司的贈閱章可證（參圖3），而第1期的封面（參圖4）亦遠較上海版（參圖5）與臺灣版（參圖6）破舊。

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原版《良友》並不全，據該館掃瞄組的章素娟女士告知，該館缺第136、137、138期三期，香港良友公司已與上海圖書館合作影印全套畫報，故所缺期數擬向北京國家圖書館借調補配。這項印行計畫顯示《良友》在當代仍受到相當關注，該套再版合訂本畫報已於2007年正式推出（即本文所稱上圖〔港〕版）。

此外，上海書店（上海版）及臺灣商務印書館（臺灣版）影印本發行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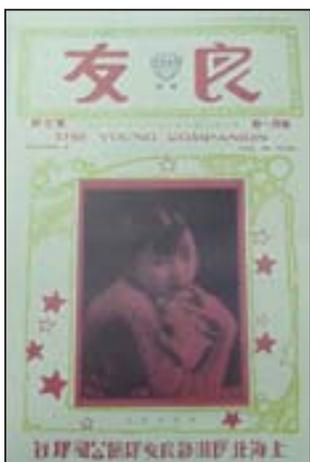


圖1：上海版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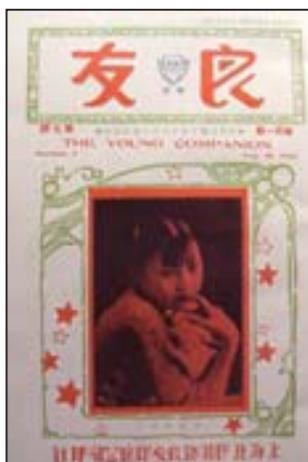


圖2：臺灣版第7期



圖3：上海圖書館收藏原版第7期

<sup>[16]</sup> 趙修慧，〈與《良友畫報》的一世情緣〉，《他與書同壽·趙家璧》（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頁27-28，按：此文原題為〈趙家璧與《良友畫報》〉，刊載於《文匯報》，2007.7.15。



圖4：上海圖書館收藏原版第1期



圖5：上海版第1期



圖6：臺灣版第1期

曾各出一冊樣本（參圖7、圖8）。

兩冊樣本的封面不同，其節選的內容雖部分主題有重疊現象，或因考量銷售



圖7：臺灣版《良友》影印本樣本



圖8：上海版《良友》影印本樣本

區域的差異，故大部分仍以各自較關注的議題為主，以臺灣版的樣本為例，與臺灣關係密切的人、事、物的篇幅即不少<sup>[17]</sup>，整本總計32頁。

<sup>[17]</sup> 如：孫中山奉安大典、國民政府建都南京、蔣介石與宋美齡婚事、張學良就任海陸空軍副司令受印典禮、臺灣地震慘狀、丹麥太子遊中國、濟南慘案犧牲者蔡公時、西安事變、飛機命名典禮、抗日軍官、臺灣土人反日運動、華僑捐款、獄中七君子、二十一條密約摘要、國際重要人物、駕機冒險家林白夫婦、空軍東征、孔德成婚禮、國內要人（蔣介石夫人陳潔如、胡適、蔣夢麟、曾虛白、郎靜山）、溥儀髮辮、偽滿州國成立、中外影壇消息、胡蝶婚禮、齊白石繪圖、梅蘭芳赴俄國、中國小姐選拔、朝鮮臺灣義勇隊、延安的文化活動、平劇四大名旦、太和

### 三、《良友》諸版對照所呈現的問題

透過上海版、臺灣版、上圖〔港〕版、北圖版之對照，呈現了如下問題：

#### (一) 頁碼印製與否

上海版與臺灣版的《良友》影印合訂本，部分頁碼不明，不知是重新影印所出現的問題，抑或是原本即已如此。

以臺灣版《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的兩幅圖片為例（參圖9），右圖為「李金髮為孫中山先生作半身塑像」，左圖則為「孫中山先生遺像」，按其編排的實際順序以及體例，於兩頁版面的左、右上角位置本應分別植入頁碼「2」、「3」，卻未加註明，原以為是最初編輯時的漏植或重印時所產生的疏漏，經比對上海圖書館所展出的原版（參圖10），確定原版印刷時即已如此，而非重新影印時所衍生。



圖9：臺灣版《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



圖10：上海圖書館收藏原版《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

《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兩幅孫中山先生塑像，未植入頁碼，依編輯慣例，有可能是「方便讀者裁切張貼」。<sup>[18]</sup>另外，《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是《良友》1926年10月第10期的號外，據馬國亮的說法，這冊圖片專集是由伍聯德主持，馬國亮說：「沒有人想到利用圖片把這個一代偉人的革命歷程，形象地提供給他的景仰者。看到這個需要的是伍聯德，他搜集了孫中山從早期直到他逝世的一生經歷，包括他各個時期的主要活動的照片，編印成專集。這是孫中山去世以後，

殿合唱歌詠團、劉海粟歐遊作品展、胡適撰寫語體碑文、袁世凱陵寢、清陵被盜、阮玲玉自殺等。

<sup>[18]</sup> 此為匿名審查人提供之意見，特此致謝。

第一本比較全面地紀錄他革命的一生的畫集。出版之後，立刻受到極大的歡迎，從國內到海外的華僑，爭相購買。特刊一再重版。當時號稱銷行近十萬冊。這個說法即使有點誇張，以孫中山的威望，銷行數萬冊是少不了。」<sup>[19]</sup>其實，該特刊的催生者、承擔編輯工作及圖文資料搜集者，應是一明耀五，特刊的版權頁上即註「騰衝明耀五」編輯；甚至在《良友》第10期裡，登出「中山特刊編者明耀五君」的照片及簡歷、編纂特刊的經過<sup>[20]</sup>，明耀五是在參加孫中山逝世週年的追悼大會後，興發了編纂的構想，明氏云：

今年春，先生逝世一週紀念，適余客京師，得躬詣靈前致奠并參與追悼大會。會內有某照相館發售先生紀念照片小冊，冊內所集，僅得銅版十餘幀，且多為殯儀之圖，與會者已爭相購置。因念苟能蒐集先生一生各時期之遺像，及與先生事蹟有關之各種照片，彙刊成冊，必可蔚為巨觀，更饒價值。且也，先生在功業上，因為建國元勳，在思想上，尤為時代先覺。有此一冊，則展卷撫視，靈感自得，先生雖逝，精神猶生焉。然此不過當時之一念而已，初未敢必其有成也。夏間來滬，以此意商諸吾友伍君聯德，君即允列為良友之號外特刊，並囑主理編事。余生世殊晚，昔在粵時雖曾數灸先生之訓，而於其事業、生平、學說、主義，仍不敢謂為諳悉；驟肩鉅任，實處隕越。顧先生致力革命，垂四十年：先生之一生，民國之創作史也；欲知民國之歷史，不可不究先生之生平，然則此刊之編纂，或亦可為讀史之一助，故不揣冒昧而任之。計議既定，即從事估做。關於圖片之審查，與夫時代之考證，均不敢出諸苟且。然先生單身照片，為數至夥，時日久遠，鑒別殊難，纂釋或乖，惟希原諒。至刊內所收圖片，雖幾達二百幅，而漏列者仍不在少數。惜印刷數多，截止期早；有道途寫遠，寄遞不及者，有投交過遲，因而遺珠者。凡此缺憾之彌補，當似他日之再版。以照片作傳，事屬創舉，

<sup>[19]</sup> 馬國亮，《良友憶舊：一家畫報與一個時代》，頁27-28。

<sup>[20]</sup> 《良友》介紹明耀五，謂：「明君籍雲南騰衝縣，十四歲時，父官滇南剝隘，隨之任所，因赴粵就學。計在粵八載，後先入培英中學嶺南大學等校，在校以能文蜚聲，曾歷任各種刊物編輯。去歲五卅後，北京開辦今是學校，君應聘北上。今夏南旋，即肩編輯中山特刊之任。自輯稿以至付印，皆親手自理，廣覽他籍，博考羣書，雖一字之微，未嘗假手他人。謂為撰著，實不為過。編輯期內，每過夜午始息。又務求確實，遇有誤點，雖已編妥亦必不憚煩勞，加以改訂。事竣後，因以刊登照片於本欄為請。君以編纂（筆者按：纂）該刊，純為崇敬孫先生之念而發，雅不欲藉此以沽名。堅請始允，想閱者亦將引為幸也。」見《良友》，1：10（1926.11），頁19。

恐閱者難得系統之觀念，爰於編次之餘，附以傳略，繫以年表，俾披閱之時，得資參照。惟隨書隨發，瑕疵不免，指誤勘訛，是賴讀者。所有圖照，除對借印諸君已隨圖註明誌謝外。其採自他書者，均未加註，惟對於原著者及出版者深表謝意。又徵集材料之時，得鍾師榮光，黃君延凱，高君廣經，張君令濤，李君士衡，莫君澄齋等予以襄助，受賜良多，附誌一言，以表謝忱。……。茲者，編理告竣，用假餘幅，敘其緣起及經過厓略於此。編者謹識。<sup>[21]</sup>

因此，更準確地說，《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是在伍聯德支持下出版，但以圖集記述孫中山的言行的原始發想以及實際編印工作，則是明耀五。

## （二）文字塗抹的底蘊

上海版及臺灣版的《良友》第88期，報導了日本對中國東北的鐵路侵佔事件，該期文字部分之標題為「日在東北的鐵路■■■」與內容之第一行、第七行、倒數第四至五行的若干字句，疑涉敏感，而呈現出塗抹的痕跡（參圖11）：



圖11：臺灣版《良友》第12冊第88期（1934年5月），頁24-25。

不知是原本出版時遭檢查當局所刪抹，抑或印行後由閱者所為？此待其他原本比對。若屬輿論箝制，則可視為彼時言論尺度的直接反映；若屬後者，則僅是讀者所為，其政治意涵止於個人認知。此一問題，筆者於2009年7月至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資料室，查索上海圖書館港版《良友》之後，有了進一步的發現。根據上圖〔港〕版的《良友》（見圖12）：

<sup>[21]</sup> 見其〈編餘贅語〉，《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1：10（192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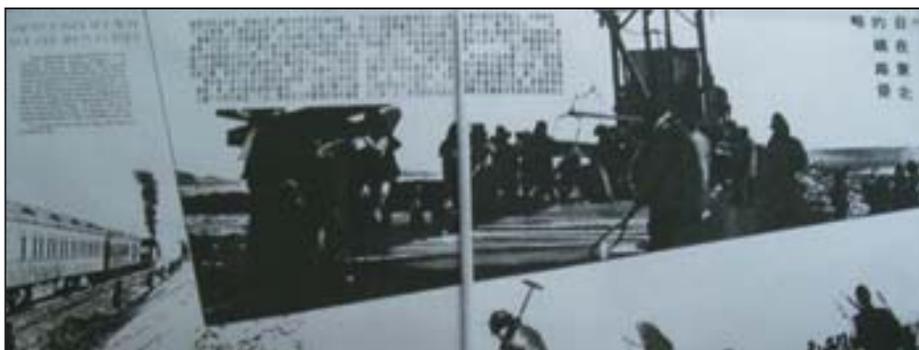


圖12：上圖〔港〕版《良友》第88期（1934年5月），頁24-25。

原標題沒有被塗抹，文字顯示為「日在東北的鐵路侵略」，至於第1行則是「暴日自掠奪我東北」、第7行末句「偽滿」、倒數第4至5行是「我東北同胞早已無瞧類矣」。由無塗抹之痕可知，影版第88期關於日本在東北的侵略一事，可能屬某讀者個人所為，並非當局所刪抹。<sup>[22]</sup>

### （三）再版發行的問題

除了印製技術層次的問題，透過不同印本之對照，亦能澄清發行上的若干疑惑，例如影版《良友》第25期之「編者的報告」，主編梁得所（1905-1938）云：

廿五期出版至今約有一個月，總發行處已無書了，因閱者之驟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好幾家代售處來信添購，都無以應付，同時定閱的亦多欲廿五期起。因此，我們決意再版，順便將初版偶有錯漏之處校正。<sup>[23]</sup>

往常，主編這類文字是向讀者說明該期編輯特色或是回應讀者來函，但第25期十分特殊，內容竟出現梁得後的後見之明，謂「廿五期出版至今約有一個月，總發行處已無書了」，何以梁得所能在發刊前已擬妥的編輯的報告裡預知該期的銷售情況？又，這期的版權頁上註明的發刊時間（1928年4月30日）與前一期第24期（1928年2月29日）相隔了一個月，按理應每月出刊，卻中斷一個月，24期與25期之間的三月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個特殊現象該如何看待？夷考其實，當有兩種可能：

<sup>[22]</sup> 本文之匿名審查人推測：「某些抗日文字的塗抹不大可能為讀者所為，亦有可能是部分畫報在上海日租界發行時遭到日本當局所塗。在臺灣戒嚴時期，當局對進口的畫刊事涉敏感的字眼、圖片也會以黑筆塗抹，或撕掉其中幾頁。」亦有可能，故繫此附參。

<sup>[23]</sup> 《良友》，3：25（1928.4），頁39。

其一、第25期原要在三月份出刊而未成，因某種理由耽擱，拖延到四月份才出刊。

其二、第25期確實已於三月份出刊，因熱銷而再版，而再版部分被視為重新出刊，期次照舊，而版權頁上的時間註記則以實際出刊的四月份為準。

就前者論，筆者以為不太可能拖期，因為在第24期的編輯談話裡，梁得所已明確表示「廿五期已經提早開始編輯」、「伍聯德君抽出一部份時間助編廿四期」<sup>[24]</sup>，梁得所此話的前提是一從第25期起要刷新並加價，故在內容上需有更多時間準備，而為了編好革新版的第25期，勢必佔去第24期的編輯時間，因此才會有伍聯德（1900-1972）協助編輯改版前的第24期云云。況且若延遲出版，依例應會在報上交代，例如：第47期因主編梁得所生病入院療養，耽擱了編務，次期（48期）即向讀者致歉<sup>[25]</sup>；第64期出刊後，受一二八事變影響而計四個月未出刊，第65期即登特別啓事說明延遲之原委。<sup>[26]</sup>另一種情況是權宜發行合刊本，例如：在1930年10月出版的第50期就是兩個月的合刊本（9-10月）<sup>[27]</sup>；而1937年7月出第130期之後，即因全面抗戰而公司所在地淪陷，不得不休刊，直到三個月後才出第131期（8-11月合刊）<sup>[28]</sup>，編者並於該期之緊要啓事裡說明公司損失慘況。準此，拖期之說難以成立。

後者則較為可能，即：原始的《良友》第25期曾印了兩次，其後臺灣版與上海版之該期底本應是當時的再版本。如此則可以合理解釋梁得所事後的「先見之明」一由於是再版，當然也就曉得初版的銷售情況，並能改正初版時的錯漏處。換言之，梁得所的這些話乃是再版時所補入的。第25期的原始初版，尚無緣得見，只能如此推論。唯根據問世的上圖〔港〕版《良友》（參圖13），《良友》第25期印了兩次，此論點已獲證實。

<sup>[24]</sup> 《良友》，3：24（1928.2），頁35。

<sup>[25]</sup> 梁得所在第48期「編後話」云：「上期正當著手編輯的時候，編者忽然破了多年不臥病的例，進醫院裏荒廢了廿多天的光陰，幸有得力的助理馬國亮君代為任勞；而出版延遲，責任該由我負，在無奈何中感著抱歉。」《良友》，6：48（1930.6），頁2。

<sup>[26]</sup> 「本報特別啓事」：「滬案發生以來，本報久未與閱者相見，原因影寫版印刷，向與商務印書館聯絡，此次日軍轟炸閘址，商務印刷所全部被燬，本報一期稿件焚去，戰事影響，出版延遲，惟閱者諒之。」《良友》，9：65（1932.5），封底。

<sup>[27]</sup> 《良友》，6：50（1930.10），版權頁（封底裡）註明：「第五十期民國十九年九、十月份合刊（十月出版）」

<sup>[28]</sup> 《良友》，19：131（1937.11），版權頁（封底裡）註明：「第一三一期（八九十及十一月號合刊）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圖13：上圖〔港〕版《良友》第25期，頁41。〔初版〕      圖14：臺灣版《良友》第25期，頁39。〔再版〕

為更清楚初版、再版間的異同，此試為比較：

首先，就版式言，上圖〔港〕版第25期《良友》之書眉處，無飛鳥圖案、無「編者的報告」字樣、「第二十五期」植於右端、頁碼是41；其次，在「編者的報告」欄裡，上圖〔港〕版之開頭與結尾內容，與臺灣版（參圖14）及上海版明顯有別，首段云：「預告了許久的第廿五期，終於擺在閱者面前了。本期的特點和今後的方針，在那裏簡單報告幾句」、未署：「一九二八，四，十五；良友編輯室。」這些文字皆為臺灣版、上海版所無。最後，就版權頁言，上圖〔港〕版載明出刊時間為：「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廿九日」（參圖15），而再版的《良友》則是：「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參圖16）。



圖15：上圖〔港〕版《良友》第25期，版權頁。      圖16：臺灣版《良友》第25期，版權頁。

總之，第25期再版時，重排了新的「編者的報告」，而從版權頁的註記，可發現在原有的香港（大道中）良友公司支店外，又增加一個「分發所」—廣州（永漢北路）良友公司支店。<sup>[29]</sup>綜上所述，商務印書館（臺灣版）與上海書店（上海版）影印本的該期底本（母本），應是當時所發行的再版本。

#### 四、《良友》編輯檯上的失察

《良友》標榜「無人不讀」、「無所不在」，讀者群非僅遍及海內外，創刊伊始更與讀者保持聯繫，開闢長期的溝通平臺，各地讀者的紛然雜陳聲音，文字、手稿、圖像照片無不容納。《良友》建立龐大的影像資料庫，主編馬國亮就稱該報照片「有些是『孤本』，即外間也無從找到的。」<sup>[30]</sup>

值得注意的是，《良友》第153期登載了一幀由讀者所提供蔣介石及其子的照片（參圖17），這張是長沙讀者李錫卿所寄，據其供稿之說明，謂：

編者先生：良友畫報是我所最喜歡的讀物，上期新聞讀者園地，更引起我們的興趣。因為看到葛培元先生寄給你們一張蔣經國先生在民國二十五年與蘇聯夫人在溪口新宅所攝的照片，刊載於上期園地，使我想起我收藏的一張更名貴的照片，那是蔣經國先生童年時與其父蔣委員長所合攝者，這張照片，也許連蔣委員長和蔣經國先生本人都沒有收藏，現在寄給貴報，請在讀者園地中發表。製版後請將原照立即寄還，因為這一張有歷史價值的照片，我是視牠（筆者按：它）如珍璧的。李錫卿 長沙<sup>[31]</sup>

李錫卿所指與蔣介石合影的男孩是「蔣經國」，此係誤認。若將李氏提供的照片與蔣緯國幼時影像（參圖18）對照，很容易判斷出男孩乃是蔣緯國。

何以《良友》未察而刊出照片？事後亦未見主編對此更正或說明。蔣介石在《良友》出現的頻率頗高，舉凡革命事蹟、軍政巡視、與宋美齡生活寫真、故鄉奉化風景、名山遊蹤等，無不入列；而日軍侵華之際，主編甚至在第121期製作了「蔣公五十壽辰紀念輯」，另外也發行《蔣委員長壽辰紀念畫冊》。<sup>[32]</sup>《良

<sup>[29]</sup> 第25期再版時又多了一個銷售地點，此可見其暢銷狀況。審查人說：「1928年，《良友》畫報的地點已達73處，其中國內有29處，國外44處，僅香港、東南亞、印度就有32處。《良友》畫報最初幾年的銷售網站是以海外為主的。」

<sup>[30]</sup> 馬國亮，〈編輯室雜記〉，《良友》，17：123（1936.12）。

<sup>[31]</sup> 《良友》，23：153（1940.4），頁40。

<sup>[32]</sup> 《良友》，刊登廣告推銷蔣介石畫冊：「搜集蔣氏歷年照片一千餘幅」、「是一部蔣氏勳業畫



圖17：讀者李錫卿提供照片，  
（《良友》第153期）。



圖18：蔣緯國幼年於寧波照相館留影，  
（《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

友》多次刊登蔣介石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影像，卻難得見到私領域的親子合影，故讀者所提供的這張照片相形之下，顯得特別，唯張冠李戴，這現象當何解釋？蔣緯國的曖昧身世，雖今人已多明瞭，但過去則是一個秘密，或由於當時大眾不清楚蔣介石的私生活，以致錯認義子「蔣緯國」為親兒「蔣經國」。

關於身世問題，蔣緯國在回憶錄裡提及二十五歲時曾對宋美齡藏書—*Inside Asia*（中譯為《亞洲內幕》，作者為約翰·根瑟〔John Gunthor〕）感到興趣：「借了回去翻閱，翻著翻著就看到裡面有段文字寫著，蔣介石的第二個兒子蔣緯國少尉，是國民黨的一位部長級官員所生，後來為了某種原因，過繼給蔣介石。文章裡沒有明指是誰，但可以看得出，是影射親伯戴季陶。」<sup>[33]</sup>為解生世之謎，蔣緯國就帶著書去找戴季陶（1891-1949），而戴季陶則以下列方式回應：「對著蔣緯國坐下來，把鏡子放中間，自己的頭擱在一邊，蔣中正的相片擱在另一邊。」他要蔣緯國照鏡子互為比較，戴氏此舉，「蔣緯國覺得有些啼笑皆非，但還是認真地看了看，然後回答：『我看我還是像父親多了些。』」，戴季陶就順勢答以：「那不就結了嗎？」把蔣緯國的疑問解決了。蔣緯國表示與戴季陶談論自己身世的話題，「就這麼一次，以後也就沒有再談過了。至於父親蔣中正，則

傳」、「是一部中國革命畫史」、「全國軍民人等，皆宜人手一冊。」17：121（1936.10），封底。

<sup>[33]</sup> 汪士淳，《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臺北：天下文化，1996），頁85。

始終沒提起過身世話題。」<sup>[34]</sup>

以上，蔣緯國的回憶片段，有三個訊息可以參考，第一、他在成年之後，才知道自己身世有疑問；第二、戴季陶沒有直接解釋蔣緯國的身世，而以迂迴手法讓蔣緯國自己認定；第三、蔣介石似未主動提及蔣緯國身世。戴季陶巧妙地否認是親父，而蔣緯國亦在成年後始知身世原委，至於蔣介石則守口如瓶。由這些線索，或可資證《良友》彼時刊登親子照，受限於訊息的掌握。

### 五、梁得所與中華民國〈國旗歌〉的歌詞

梁得所愛好美術、音樂，尤其音樂，不僅編譯了《世界名歌集》、《音樂辭典》，《良友》亦常載其譯詞並配以歌譜，此外，自己也創作歌詞，其中比較引人注意的是：他寫了一首國旗歌詞，名為〈青天白日滿地紅〉（圖19），梁得所該作發表於第37期（1929年7月），由Thomas A. Becket作曲。

另外，梁得所於1930年12月第52期的《良友》首頁，將〈青天白日滿地紅〉詞與孫中山肖像浮雕圖片搭配（參圖20，梁詞在畫面右下方框內〔白底黑字〕，左上角則是于右任所題「良友」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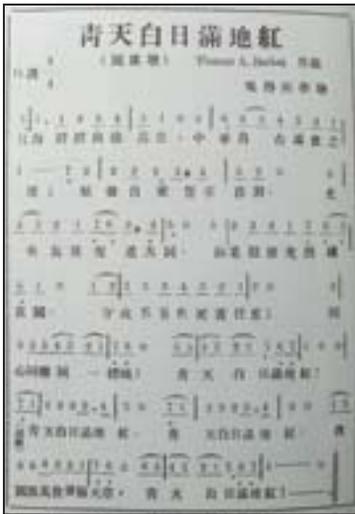


圖19：梁得所撰寫〈青天白日滿地紅〉，（《良友》第37期，頁31）。



圖20：梁得所〈青天白日滿地紅〉作為卷頭語，（《良友》第52期，頁1）。

<sup>[34]</sup> 以上所引，均見《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頁85、86。

梁得所不僅寫了〈青天白日滿地紅〉，身為《良友》主編，他也代表良友公司捍衛旗幟。1927年3月26日英軍拔走懸掛在良友公司門前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4月出刊的《良友》隨即報導了公司抗議並索回旗幟的經過<sup>[35]</sup>；1927年10月第20期《良友》則報導「中國三民輪船」—「第一次升青天白日旗」到南洋的消息（附國旗圖片）。梁得所在主持大眾出版社時期，他所主編的《大眾》畫報第12期（1934年10月）封面即有梁韜雲繪製的國旗圖樣（參圖21）；而梁氏主編的另一刊物《文化》月刊第1期（1934年2月）更轉載了蔣介石所寫的〈國旗的歷史〉。



圖21：《大眾》第12期「孩童向國旗致敬」封面書影

1928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國民政府旋於11月2日制訂「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以「青天白日」為國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並於12月17日公布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全國使用。<sup>[36]</sup>隔年，1929年梁氏即在《良友》發表了

<sup>[35]</sup> 良友公司為慶祝北伐成功，懸國旗於公司門外，《良友》報導謂：「不料於三月廿六晚十時許，有英兵將該旗扯下，連旗桿一併攜入對面之英兵駐紮所。當時有過路林君親見，勸阻無效，次早特來告知。良友公司即去函質問，現已由該軍長官將旗交還，旗桿亦已賠償。惟公司以國旗代表國體，故仍報告市政府及黨部，請向交涉。」此事見《良友》，2：14（1927.4），頁6。

<sup>[36]</sup> 國史館審編處：《中華民國國旗與國歌史料》（臺北：國史館，2000），見「國民政府訓令直轄各機關並函中國國民黨中執會制定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明令公布並通飭施行」、「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頁20-28。另見孫鎮東：《國旗國歌國花史話》增訂再版（臺北：1986，張慶煌發行〔未註明出版機構〕），頁31；劉碧譽，〈中華民國國父·國旗·國歌·國旗歌的歷史〉，《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2（2008.11）。

〈青天白日滿地紅〉歌詞，然一般認為〈國旗歌〉歌詞出自戴傳賢（戴季陶），而由黃自（1904-1938）譜曲，臺灣的音樂教科書中也註明歌詞由戴傳賢所作（參圖22、23）。<sup>[3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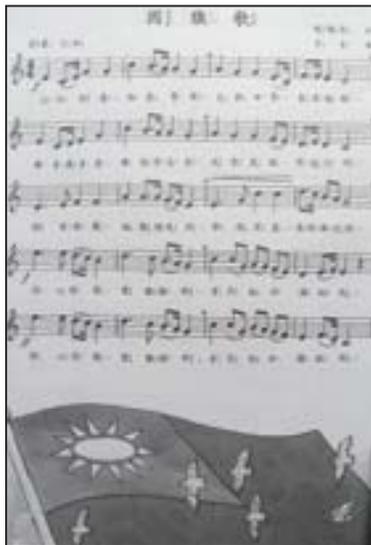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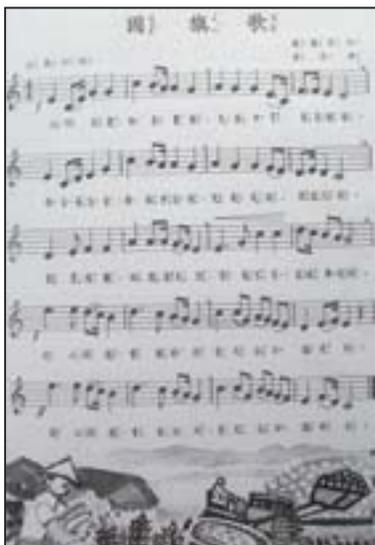


圖22：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小學音樂》，第1冊〈國旗歌〉歌譜（1978年出版）。 圖23：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小學音樂課本》，第1冊〈國旗歌〉歌譜（1991年出版）。

但依筆者目前查索到的戴季陶撰《戴季陶先生文存》<sup>[38]</sup>、陳天錫著《戴季陶（傳賢）先生編年傳記》<sup>[39]</sup>、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續編》以及《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編》<sup>[40]</sup>、章開沅主編《戴季陶集》均無相關創作的記載，不知何故？又，檢按中華民國外交部、國史館、國父紀念館、中國國民黨所刊布的資料，多謂出自戴傳賢之手筆，歌曲則為黃自所作<sup>[41]</sup>，至於詞曲何時撰寫、戴季陶是撰詞

<sup>[37]</sup> 有關教科書上的〈國旗歌〉歌詞撰者，筆者目前掌握到的說法，即有：戴傳賢、韋瀚章。針對不同教科書上所錄國旗歌之比較，筆者將另文細論，此不贅。

<sup>[38]</sup> 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

<sup>[39]</sup> 陳天錫，《戴季陶（傳賢）先生編年傳記》（臺北：文海，1977）。

<sup>[40]</sup> 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續編》（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7）、《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編》（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71）。

<sup>[41]</sup> 劉碧濤云：「是來自戴傳賢先生之手筆；歌曲則為黃自先生的創作。」見其〈中華民國國父·國旗·國歌·國旗歌的歷史〉，《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2（2008.11）；又見中國國民黨「關於KMT」之〈國旗歌的作曲與作詞〉，<http://www.kmt.org.tw/hc.aspx?id=29&cid=25>；外交部「國情資料」之〈國旗國歌國花〉，著重介紹國旗設計者及頒行狀況、歌詞意義，但未明言詞曲作者，<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41330&CtNode=619&mp=1>。另「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詳見「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20020>。

者之說法來源，則未見相關紀錄。再從譜曲者黃自的線索去追，依照戴鵬海主編的〈黃自年譜〉1933年9月條，載：

《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第一冊出版。其中有黃自新創作的獨唱歌曲六首，《九一八》（韋瀚章詞）、《花非花》（白居易詞）、《雨後西湖》（韋瀚章詞）、《峨眉山月歌》（李白詩）、《農家樂》（劉雪庵詞）、《新中國的主人》（劉雪庵詞）；混聲四部合唱一首《青天白日滿地紅》（詞作者佚名）。……。<sup>[42]</sup>

據戴鵬海表示：

關於《青天白日滿地紅》，據黃自夫人汪頤年的回憶及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音樂雜誌》一卷二期上的《樂藝消息》—「國歌歌詞中央將開會為最後之審定」的記載，情況如下：國民黨當局一直沒有國歌，而用程懋筠作的《黨歌》暫代。為此，當時的教育部曾徵求國歌歌詞，並從來稿中選出數十篇，組織音樂界來譜曲，黃自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就是根據教育部發下來的國歌歌詞中的一首譜寫的。後來，這首歌並沒有入選，黃自就把它作為一般的創作歌曲發表了。<sup>[43]</sup>

戴鵬海說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33年出版了第一冊《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由黃自、張玉珍、應尙能、韋瀚章所合編，該教材收錄「青天白日滿地紅」，但作詞者方面卻註記「詞作者佚名」；又，戴鵬海指出〈青天白日滿地紅〉是當時教育部徵求來的〈國歌〉歌詞，黃自根據其中一首詞而譜寫，後因故

<sup>[42]</sup> 戴鵬海，〈黃自年譜〉，《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1981），頁21。按：受商務印書館委託，黃自與韋瀚章等人合編《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自1933年至1935年，全書六冊始出齊。事實上，黃自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第一本歌集，據其年譜1933年6月條下記載：「包括〈春思〉〈思鄉〉〈玫瑰三願〉等三首獨唱歌曲在內的《春思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黃自生平及出版歌集一事，1933年10月出刊的《良友》亦有相關報導，不僅刊載跨頁的〈思鄉〉歌譜，並謂：「思鄉一曲，作詞者韋瀚章先生，作曲者黃自先生，黃氏畢業於美國耶路大學音樂系，曾得學校特獎，歸國後譜有懷舊曲序樂一篇，上海工務局伯器氏所指揮之管弦樂團曾公開演奏，國人製曲之經該團演奏者實以黃氏之作為始。黃氏現任國立音樂專門學校教務主任，及上海工務局音樂委員之職。近與韋氏合作春思曲一集，在商務印書館印行出版，思鄉，即集中之一闕也。」見《良友》，11：81。又按：《良友》第81期介紹黃自，此時編務已由馬國亮接手。

<sup>[43]</sup> 戴鵬海，〈黃自年譜〉，《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1981），頁22。又按：黃自在梁得所離開《良友》之後，於1934年與蕭友梅（上海音專校長）、韋易齋（任教上海音專）共同主編良友公司發行的《音樂雜誌》。

未能入選，故改以一般歌曲發表<sup>[44]</sup>，既是官方的徵稿，何以黃自所譜寫的這首曲子，填詞者竟是「佚名」，而非其後傳言的戴季陶？再翻檢目前收錄黃自作品最全的《黃自遺作集》，編輯戴鵬海稱「受有關規定限制」，故「青天白日滿地紅」未能收入。<sup>[45]</sup>臺灣出版的《黃自先生歌曲選》收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參圖24）<sup>[46]</sup>，其曲譜右上方載記「黃自曲」，唯作詞者仍闕如。

另，劉美燕的《黃自研究》分析了〈國旗歌〉的歌詞、曲式、曲調，並附樂譜（參圖25）<sup>[47]</sup>，譜子右上角亦僅記「黃自曲」，撰詞者姓名依舊未見。



圖24：〈青天白日滿地紅〉[局部]，  
（《黃自先生歌曲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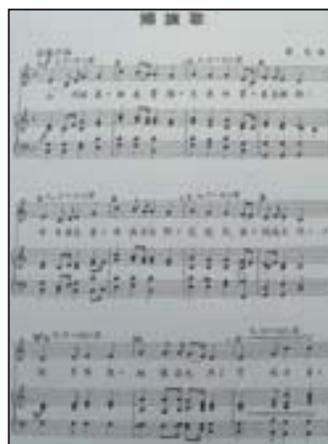


圖25：〈國旗歌〉[局部]，  
（《黃自研究》）

以上種種跡象顯示，現存〈國旗歌〉之問世應不晚於1933年，但究竟由誰填詞，恐怕黃自當時也並不清楚，按理，戴季陶身居國民政府大員，果真為國旗撰詞，當屬榮耀，沒有道理不欲人知。

〈國旗歌〉的這個世紀之謎，筆者從梁得所主編的刊物，發現了較為可靠的答案。梁得所主編的《大眾》畫報第12期（1934年10月），刊出一頁篇幅以介

<sup>[44]</sup> 梁得所〈青天白日滿地紅〉歌詞曾是〈國歌〉徵選的遺珠之作，何以專為國旗而寫的歌詞竟被劃為教育部擬求〈國歌〉歌詞範疇？筆者將以另文探究。

<sup>[45]</sup> 戴鵬海謂：「除《Giyen》（英文歌詞）、《反日運動歌》、《陽春到來》、《務本小學幼稚園歌》等四首因曲稿殘缺不全，《峨眉山月歌》因與《下江陵》曲調相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慶》、《國慶獻詞》、《總理逝世紀念》、《農家樂》等六首受有關規定限制外，其他81種全部收入本分冊。」見其〈分冊說明〉，收入上海音樂學院《黃自遺作集》編輯小組：《黃自遺作集》聲樂作品分冊（合肥：安徽文藝，1997），頁11

<sup>[46]</sup> 黃自，《黃自先生歌曲選》（臺北：幼獅文化，1976），頁2-3。

<sup>[47]</sup> 劉美燕，《黃自研究》（臺北：樂韻，1984），頁100-101。

紹〈國旗歌〉作詞及譜曲者（圖26）。



圖26：梁得所在《大眾》畫報上，刊介戴季陶〈國旗歌〉。

圖24的右半頁是〈國旗歌〉曲譜，並註明：「戴季陶作歌」、「杜庭修製譜」字樣，戴季陶〈國旗歌〉歌詞內容如下：

中國國民志氣洪，戴月披星去務農；犁盡世間不平地，協作共享稻梁豐；地權平等，革命成功！人羣進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滿地紅。

中國國民志氣洪，頂天立地做勞工；鋼鏟鏟開平等路，鐵錘錘出自由鐘；階級消盡，革命成功！人羣進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滿地紅。

中國國民志氣洪，披堅持銳打前鋒；熱血洗清新世界，民族平等樂無窮；霸權除盡，革命成功！人羣進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滿地紅。

中國國民志氣洪，教育普及東方東；科學完成真改造，文化統一天下公；智識普遍，革命成功！人羣進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滿地紅。

戴季陶這首寫於民國17年的〈國旗歌〉，內容竟與現今流傳的中華民國〈國旗歌〉不同，八十多年來，各界多以為出自戴之手筆，恐係誤認。反倒是梁得所撰寫的〈青天白日滿地紅〉與現在流傳的〈國旗歌〉有多處雷同（三首國旗歌之比較，詳後）。

圖版右上是兩名青少年向國旗致敬的圖像，右下為一則由編者誌寫的〈介紹國旗歌製譜者〉短文，為方便討論，茲摘錄如下：

梁得所不僅介紹了製譜者杜庭修的背景，也附了杜氏照片，並摘引杜庭修之《仁聲歌集》裡對〈國旗歌〉創作的說明文，杜文提到撰詞者、創作時間以及為何製譜的動機：

國旗歌是戴季陶先生民國十七年的作品。既通俗，又文雅，極合一般民眾歌詠之用。我看見這個歌，如獲至寶，很高興的擬了一個譜，就是現在印的這個譜。教育部懸賞徵求國歌經過三四個寒暑，沒有得著滿意的答案。我因國民政府成立了已經好幾年，還沒有正式的國歌（！）就向教育部建議，把國旗歌定為現用國歌；因這首國旗歌，是在革命過程中具有切確的意境，很可以作國歌用。大凡一個國歌的成立，都有相當的背景，如德國的國歌，是防守萊因河的軍歌。英國的國歌，是以天子萬年代表憲法永立。法國的國歌，更是一個膾炙人口的革命歌，這些國歌，全是各個民族的風俗，生活，和奮鬥過程的結晶，不是偶然的事情。因為國歌不是搜索枯腸，咬文嚼字所能產生的。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對於精神與物質的建設，不算不努力，可惜沒有一個國歌！為砥礪國民精神，為國家爭體面，國歌的產生，實不能再緩。<sup>[48]</sup>

編者梁得所既然明言此處資料乃轉載於杜庭修《仁聲歌集》，筆者遂回查杜氏之作，《大眾》所刊確係為戴氏詞、杜氏曲的組合（參圖27，右上角註明「杜庭修製譜」，左上角則寫「戴季陶作歌」）。

<sup>[48]</sup> 《大眾》，12（1934.12），頁28。梁得所此段引文為節錄，部分杜君文字有刪減。杜原文為：「國旗歌是戴季陶先生民國十七年的作品。戴先生的精神，思想，和他革命過程中的體驗，及對於祖國的希望，在這歌中完全流露。既通俗，又文雅，極合一般民眾歌詠之用。我看見這個歌，如獲至寶，很高興的擬了一個譜，就是現在印的這個譜。教育部懸賞徵求國歌經過三四個寒暑，沒有得著滿意的答案。我因國民政府成立了已經好幾年，還沒有正式的國歌（！）就向教育部建議，把國旗歌定為現用國歌；因這首國旗歌，是在革命過程中不可多得的一個好歌，很可以作國歌用。對於這個建議，雖然教育部沒有若何的表示，但就我所知所見的新歌中，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這個歌。所以我以國旗歌作國歌的原議，至今還沒有打消。大凡一個國歌的成立，都有相當的背景，如德國的國歌，是防守萊因河的軍歌。英國的國歌，是以天子萬年代表憲法永立。法國的國歌，更是一個膾炙人口的革命歌，這些國歌，全是各個民族的風俗，生活，和奮鬥過程的結晶，不是偶然的事情。即使再繼續徵求十年，也恐怕沒有太了不得的結果！因為國歌不是搜索枯腸，咬文嚼字所能產生的。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對於精神與物質的建設，不算不努力，可惜還沒有一個國歌！為砥礪國民精神，為國家爭體面，國歌的產生，實不能再緩。」按：黑體字為杜原文與《大眾》載文不同之處。杜庭修〈國旗歌〉之說明，見其《仁聲歌集》3版（南京：仁聲印書局，1933），頁14。



圖27：《仁聲歌集》所載〈國旗歌〉書影

茲將戴季陶〈國旗歌〉、梁得所〈青天白日滿地紅〉、現今中華民國〈國旗歌〉三者，對照如下表：

歌名	〈國旗歌〉	〈青天白日滿地紅〉 (另註副題：國旗歌)	中華民國〈國旗歌〉
作曲	杜庭修	Thomas A. Becket	黃自
作詞	戴季陶	梁得所	？
時間	1928年	1929年	樂譜不晚於1933年； 歌詞則於1933年之後
歌詞	<p>中國國民志氣洪，戴月披星去務農；犁盡世間不平地，協作共享稻梁豐；地權平等，革命成功！人羣進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滿地紅。</p> <p>中國國民志氣洪，頂天立地做勞工；銅鑼鑼開平等路，鐵錘錘出自由鐘；階級消盡，革命成功！人羣進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滿地紅。</p> <p>中國國民志氣洪，披堅持銳打前鋒；熱血洗清新世界，民族平等樂無窮；霸權除盡，革命成功！人羣進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滿地紅。</p> <p>中國國民志氣洪，教育普及東方東；科學完成真改造，文化統一天下公；智識普遍，革命成功！人羣進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滿地紅。</p>	<p>江海滔滔，山嶽高崇，中華自古為世之雄；願毋自棄，誓不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艱難，先烈建民國，守成不易，後死責任重；同心同德，同一標幟：青天白日滿地紅！</p>	<p>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胄，東亞稱雄。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p>

比較三首歌詞的字句，很明顯地，戴傳賢之作與其他兩首的差異較大。暫不論其間相近的歌詞意境，僅就單字部分來看，中華民國〈國旗歌〉總計67字，當中有36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雷同，相似度達53%；其中，有多句甚至全同。就現有的材料推測，其原創者很可能是梁得所<sup>[49]</sup>，那麼又是誰以梁得所之作爲底本進而增補爲〈國旗歌〉？假設是戴季陶，目前可見的文獻裡卻又呈現「佚名」狀態，筆者考諸戴季陶的專著，亦未發現該詞作，似間接否定了戴季陶與中華民國〈國旗歌〉的關係；復次，戴季陶確曾於1928年寫過一首名爲〈國旗歌〉，但內容與中華民國〈國旗歌〉有別，此或因題名同，後人不查，而致「張冠李戴」。

戴季陶是否曾以梁得所之作爲底本，在其基礎上增補爲中華民國〈國旗歌〉，這似乎亦不能完全排除，理由是：梁得所於《良友》發表〈青天白日滿地紅〉四個月之後，1929年11月第41期出刊的《良友》首頁，登載了戴季陶爲《良友》所題的「良友」二字（參圖28）。梁得所主編《良友》時，常以圖、文刊登國府要員的近況，戴季陶多次現身其中<sup>[50]</sup>；《良友》第46期甚至有梁得所赴杭州採訪全運會的相關新聞，他在該期的編輯心得裡也轉述了全運會會長戴季陶的談話內容。<sup>[51]</sup>戴季陶應看過《良友》，否則很難解釋他爲《良友》親筆題

---

<sup>[49]</sup> 梁得所於〈國旗歌〉的原創角色，本文初稿撰就後，筆者又在1933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第一冊裡發現更直接的證據，該書收錄了黃自譜曲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其樂譜與現行〈國旗歌〉相較，現行版的主音（主調）之第四、五、十節的極少音符略有出入外，餘皆一致，這個現象說明了今日〈國旗歌〉的曲子當源自〈青天白日滿地紅〉，亦即1933年即有現行〈國旗歌〉樂譜，但歌詞則在此之後（因1933年這首〈國旗歌〉仍是原創的梁得所〈青天白日滿地紅〉歌詞）。此樂譜即中華民國「山川壯麗」〈國旗歌〉曲調，歌詞雖未註明撰人，檢視內容，正是梁得所於1929年發表在《良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歌詞。梁得所是〈國旗歌〉的原創者，殆無疑問。

<sup>[50]</sup> 例如：「國委戴季陶近影」（《良友》第29期）、「新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長戴傳賢像」（《良友》第31期）、「迎凱大會主席戴季陶」（《良友》第53期）、「國民會議主席戴季陶」（《良友》第57期）、「戴傳賢院長」（《良友》第78期）等。

<sup>[51]</sup> 梁得所云：「戴季陶會長在歡迎會中講得很清楚，他的大意是說：『中國從前的打擂台和江湖賣武，形式上和現代的運動會相仿佛（筆者案：即彷彿）；可是前者以個人爲本位，後者注重團體化的組織』。獨夫拳腳的競爭時代已經過去了，現代競爭的特徵，是合小力爲大力，合大力爲更大力，各項球類比賽最足以證明這原則。」見其〈編者講話〉，《良友》，6：46（1930.4），頁2。

字之舉。由《良友》這層關係看，他可能曾經讀過梁得所〈青天白日滿地紅〉歌詞。<sup>[52]</sup>



圖28：戴傳賢為《良友》第41期題字

綜合上述，梁得所在〈國旗歌〉問世過程裡的原創角色，當可確定，現今的中華民國〈國旗歌〉歌詞，原創者應即梁氏，至於誰在他的基礎上去增補則待續考。

## 六、餘論

本研究強調報刊雜誌是瞭解歷史的重要環節，是觸摸中國現代歷程所不宜輕忽的文獻，誠如陳平原所言讀報刊「經常可以發現新的資料，讓我們對舊說提出質疑，對歷史有新的解釋。」<sup>[53]</sup>筆者辨究《良友》、《大眾》內部的特殊現象，也藉由兩刊與其他文獻的橫向比較，疏理刊物的版本、圖片及其衍生的相關問題。

<sup>[52]</sup> 另，梁得所歌詞曾被列為國歌徵選稿件，關於梁得所〈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歌被列入國歌徵選稿件一事，將另以專文析論，此不贅，而稿件均送呈時任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審查（見中國國民黨中宣部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致禮俗司科長李安函件內容「已送戴委員傳賢審查」云云），因此，戴氏可能見過梁的詞作。

<sup>[53]</sup> 陳平原，〈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台大》（臺北：麥田·城邦文化，2005），頁33。

本文主要涉及了《良友》諸版源流辨析、《良友》諸版對照所呈現的問題、考權《良友》編輯檯上之失察；此外，又透過《良友》及《大眾》，追索暨解決誰是中華民國〈國旗歌〉歌詞作者的疑問，根據筆者以詞追人，歌詞應與梁得所有關，梁得所在〈國旗歌〉問世過程裡的原創角色，當可確定；而戴季陶潤飾梁詞的可能性，也許不能排除。

# Reorganization and Deliberation: Several Questions Derived from *Liangyou Huabao*, *Cosmopolitan Huabao*, and T.S. Leung

Liu, Yi-Li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ome versions, pictures and derived questions of the famous pictorials in modern Shanghai, *Liangyou Huabao*, and *Cosmopolitan Huabao*, mainly related to four aspects. 1. Analyze several copies of *Liangyou Huabao*. 2. Discriminate: printing page numbers, erasing words, and republishing of pictorials. 3. Differentiate photographs once misrecognized by readers of *Liangyou Huabao*. 4. Speculate the question about the lyric writer of the "National Flag Anthem" through *Liangyou Huabao* and *Cosmopolitan Huabao* edited by T.S. Leung.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at the 25th issue of *Liangyou Huabao* had been republished, and the situation of erasing words in the 88th issue should be done

---

**Keywords (關鍵詞)** : *Liangyou Huabao* (*the Young Companion Pictorial Magazine*) ; *Cosmopolitan Huabao* (*the Cosmopolitan Pictorial Monthly Magazine*) ; T. S. Leung; Shanghai; National Flag Anth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 Tao Dai; Jing Guo Jiang; Wei Guo Jiang; Zi Huang  
良友；大眾；梁得所；上海；國旗歌；戴季陶；蔣經國；蔣緯國；黃自

Liu, Yi-L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t. Mary's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College ; E-mail : ncue610@gmail.com

by some reader himself. As for the *Special Issue in Memory of Dr. Sun Yat-Sen*, the original had already omitted printing page numbers, rather than happened when reprinting. Besides, *Liangyou Huabao* was not aware of what readers had misunderstood, and mistook Wei-Kuo Chiang as Ching-Kuo Chiang.

This article also tries to identify "Clear Blue Sky, White Sun, and a Wholly Red Earth" written by T.S. Leung and printed on *Liangyou Huabao*, which was the master copy of the lyrics of the "National Flag Anth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clarify the official version that the lyrics of National Flag Anthem came from Ji-Tao Dai, and then speculates that the originator of National Flag Anth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be T.S. Leung.